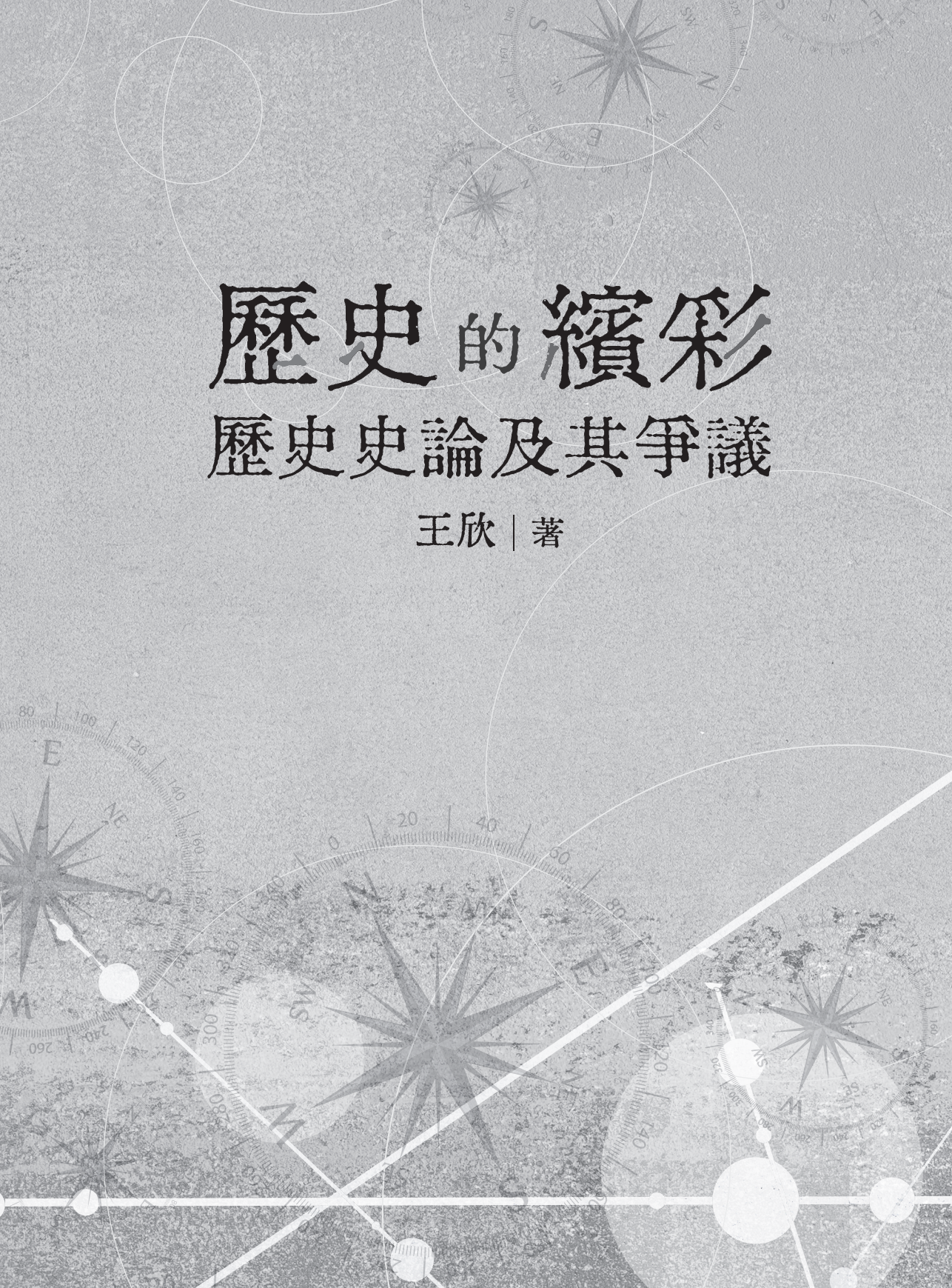




歷史的繽紛

歷史史論及其爭議

王欣 | 著

導論 從史料、史觀、歷史方法看歷史的繽紛

I 如何闡述與解讀歷史？

歷史是對過去存在人物與發生事件的闡述與解讀，而人是如何闡述與解讀歷史呢？文學家藉由想像力鋪張文藝世界；物理學家透過數學與物理理論論證物理現象；藝術家經由美之創意呈現藝境。從歷史學者的探討不難發現，他們都是透過史料、史觀、歷史方法闡述與解讀歷史。史料是闡述歷史的依據與基礎，史觀是解讀歷史的管鏡，歷史方法是探討歷史的門路、方式、手法。歷史的探討與議論都是透過史料、史觀、歷史方法開展。筆者稱史料、史觀、歷史方法是歷史探索三要素。歷史探討若沒有此三要素，歷史便脫離歷史學，變成文學、哲學、宗教。

許倬雲認為，史學工作有三部，即「取得素材」、「組織史料」、「解釋」。¹「素材」是史料，歷史學者使用史料的判斷、鑑定、取捨等確定歷史撰寫材料；「組織」是闡述歷史的「方式」，例如：大事記、本紀、年譜、傳記與紀事本末等；「解釋」是對「史事本身找出明顯的意義」。²綜觀許倬雲史學工作三部，歷史工作涵蓋史料／素材、歷史方法／組織、史觀／解釋，而這三部與筆者的歷史探討三要素一致。

¹ 許倬雲，「在史學領域漫步」，《求古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485。

² 許倬雲，「在史學領域漫步」，485。

II 歷史闡述的依據與基礎——史料

史料是歷史論述的依據與基礎。不按史料述說歷史，歷史將成為想像與空中樓閣。史料包括過去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各種紀錄，有文字紀錄（正史、文集、方志等）、考古與口述資料等。許倬雲認為，史料不僅是「文字書寫的紀錄」、「檔案」，還涵蓋「一切曾經人類手澤的東西」，是「眾多和龐雜」的。³但他提出，歷史學者在搜集史料時是「有目的的，有假定的」，在整理資料時「心目中存了某一目的，判定了這種史料對於解決某一項或某一類歷史問題有其用處，他才會以一定的尺度和標準，選擇他要用以考證的史料」。⁴杜維運指出，史料是「實錄」，但所涉及的人物與事件的變幻、思想、情感、奧秘等，「都非資料所能完全披露」。⁵因此，史料存有某些「缺陷性」，能揭露的歷史是「有限度」的。⁶從許與杜可知，史料有目的與假定、缺陷與有限，整理史料時以「一定的尺度和標準」來「選擇」，則具主觀性。因此，史料雖是歷史闡述的依據與基礎，但它不是絕對、客觀，反而是相對、主觀。

若闡述歷史欠缺史料依據，歷史只能立基於虛構或想像。如《三國演義》與《三國志》都講述魏蜀吳三國歷史，《三國演義》是歷史小說，未必需要史料根據；《三國志》是正史，必須按史料說話。具體而言，《三國演義》的桃園結義無法考證，是虛構的，放入小說沒有問題，然則《三國志》不能把無法考證的桃園結義故事納入歷史，因為歷史必須憑史料依據闡述。

³ 許倬雲，「在史學領域漫步」，486。

⁴ 許倬雲，「在史學領域漫步」，486。

⁵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205。

⁶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205。

呂實強與李恩涵在探討清末教案時主要使用中國的《教務教案檔案》、《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基於這些史料，他們總結清季反教主要肇因於官紳妄尊、西方武力、中國民眾與官紳對基督教傳教的誤解。⁷史維東（Alan R. Sweeten）也使用《教務教案檔案》，更徵引法國與美國傳教士的報告、信件、評論與各國檔案館資料，讓史料不是中方資料一面倒，而能維持中國官方與西洋傳教方資料的平衡、互照、對比。⁸如此一來，他在清末江西地區看到的天主教不是充滿紛爭、衝突、矛盾、對立，反而呈現民眾與教會相互適應、協調、調整、和睦的歷史圖景。⁹史維東的中西平衡史料運用描繪出的清末教案圖景與呂實強與李恩涵相異。

另外，隨著新史料發現與運用，歷史人物的評論可不同。中國共產黨正統毛澤東闡述與評價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與中共官方學者逢先知與金沖及的《毛澤東傳》中。他們文中的毛是對建黨與建國有至上功績，只是在1949年後「急於」建立社會主義（1957年之前）、大躍進（1957年）、廬山會議（1958年）、打擊

⁷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3），2-8、63-115、130-85；李恩涵，「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9-27；李恩涵，「同治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39-84。

⁸ 史維東使用的法文檔案史料有《遣使會傳教年鑑》、《在華遣使會》、《遣使會檔案》（法國巴黎）、《遣使會在華傳教回憶錄》、《天主教佈道會年鑑》、《田嘉璧主教傳記》（1892年）等；英語檔案有《在華遣使會》（愛爾蘭神父手稿）。他還使用南特（Nantes）外交檔案中心、巴黎教會檔案館、巴黎仁愛會檔案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愛爾蘭都柏林聖高龍龐外方傳教會等檔案資料。史維東，《中國鄉村的基督教——1886—1900年江西省的衝突和適應》，吳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9（註4）、10（註2）、24（註1、3）、25（註1）、27（註1）、75（註5）、115（註4、5）、122（註5）、127（註5）、167（註1）、196（註1）、211-27。

⁹ 史維東，《中國鄉村的基督教》，64-67、132-38、190-210。

劉少奇（1968年）、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等有錯誤。¹⁰但是，張戎與哈利戴（Jon Holiday）透過龐大檔案館與採訪口述史料，敘述毛「不為人知的故事」（the unknown story），他們筆下的毛是自私、不負責、陰謀、邪惡、報仇的化身。¹¹

史料是歷史論述的依據，描繪歷史必須以史料為基礎與依據。隨著不同史料運用或各種史料的平衡、互照、對比，同一歷史人物面目可有異樣，同樣歷史事件可改寫。

III 解讀歷史的管鏡——史觀

史觀是解讀過去人物與事件的管鏡。過去歷史藉史觀解讀，歷史不可能沒有史觀。車河淳認為，史觀涵蓋「歷史的見解、解釋、觀念、思想」，對「歷史時間有強烈自覺」，而此自覺是「對社會與文化的變化與發展的時間性前後關係有認知後才能形成」。¹²許倬雲主張，史觀是歷史研究的「另一個角度」、「觀念」，歷史學者都有「自以為是」之史觀。¹³他批判，馬克思基於進化論提出「自

¹⁰ 吳江編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1、13-14、30、35-36、47、49、53-63；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417-18、844；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1009-10、1379-84、1533、1537。

¹¹ 「不為人知的故事」是張戎與哈利戴的《毛澤東傳（Mao）》的副題。他們訪問前蘇聯、東歐、德國、義大利、英國、美國、臺灣、中國等檔案館，並在中國、臺灣、香港、美國、英國、蘇聯、東歐等地採集了毛澤東相關人物的口述史料。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82-87, 141, 324-25, 419-20, 423-25, 443-50, 503, 508, 528-31, 536, 546-47, 624, 630, 637-52.

¹² 차하순, 「서론」, 차하순 편집, 《사관이란 무엇인가》(서울: 청람출판사, 1983), 9[車河淳, 「序論」, 車河淳主編, 《史觀是什麼》(首爾: 青藍文化社, 1983), 9]

¹³ 許倬雲, 「在史學領域漫步」, 488-89、492。

以為是」的唯物史觀，指出西方學者已不肯定馬克思的原始共產社會，其中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對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提出非歷史進化論的獨特因素。¹⁴至此，馬克思的「自以為是」、「科學理論」史觀面臨危機。筆者認同史觀涵蓋「歷史的見解、解釋、觀念、思想」，也就是「自以為是」的「觀念」。事實上，東西方的史觀層出不窮、眼花撩亂，例如：大義鑑戒史觀（《尚書》、《春秋》、《資治通鑑》）、直線終末史觀（奧古斯丁）、理念史觀（黑格爾、牟宗三）、循環史觀（聖經申命記史家、董仲舒、Giambattista Vico）、唯物辯證史觀（馬克思主義者）、實證主義史觀（Auguste Comte、Leopold von Ranke）、相對主義史觀（Carl Becker、Charles Beard）、啟蒙進步史觀（英國輝格派）、文化文明史觀（斯賓格勒、湯恩比）、內在理路史觀（余英時、Paul Cohen）、小歷史史觀（年鑑學派、黃仁宇、Jonathan D. Spence）等，歷史學者都按自己主觀選擇的史觀解讀歷史。

司馬光的鑑戒史觀透過「王道與霸道」、「人君與君心」等，作人物褒貶基準。錢穆指出，戰國時期屈原在文學與外交不容忽視，但司馬光基於他的史觀，在《資治通鑑》從未提及他。¹⁵另外，司馬光援用陳壽《三國志》對蜀國張飛遭帳下將領被殺事件說：「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但沒有論述張飛的勇猛無畏。¹⁶司馬光還徵引《三國志》對張飛的評論，即「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低估張飛。¹⁷在司馬光的鑑戒史觀下，

¹⁴ 許倬雲，「在史學領域漫步」，492-93。

¹⁵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45。

¹⁶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六十九（臺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85），605。

¹⁷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793；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六十九，606。

張飛因「不恤軍人」而無仁心被殺，「暴而無恩」的短處招致失敗。《資治通鑑》中「不恤軍人」或「暴而無恩」的張飛，與《三國演義》的張飛評價迥然不同。

楊天石與張淑雅都使用新公開的蔣介石日記為史料，探究蔣介石真實面目，但他們因持不同史觀，呈現不同的蔣面目。楊天石持大人物式台上史觀，專注遷臺後蔣在臺灣的內政、外交、反攻大陸等台面、顯見、公開的蔣面貌。¹⁸在他筆下，蔣是「痛定思痛、死中求生，力圖重新舉起孫中山旗幟」，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與大陸中共對抗」的領袖。¹⁹張淑雅持小人物式台下史觀，觀察蔣的日常生活、小細節，矚目台下、不易見、隱藏的蔣史料。她發現蔣的日常、小事、小細節影響他獨裁作風、重大國家內外要務的想法與決策、反攻大陸的調整，以及逆境轉念的生存之道等。²⁰最後，張看到如下蔣介石：

與其說是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專斷獨行、冷酷無情的獨裁者（或「偉大領袖」），不如說是個屢戰屢敗，處處、事事、人人都不如意，人生經歷

¹⁸ 對遷臺後蔣介石，楊天石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2冊探討「國民黨遷臺與蔣介石反省」、「蔣介石在臺復職與李宗仁在美抗爭」、「蔣介石三次反對用原子彈進攻中國大陸」、「蔣介石、宋美齡的戀愛與婚姻」。在第三冊，他論及「蔣介石與釣魚島主權爭議」、「陳潔如回憶錄何以塵封三十年」、「蔣介石聯合蘇聯，謀策反攻大陸始末」、「尼克森競選與蔣介石、宋美齡的晚年感情危機」。在第4冊，專研「蔣介石與陳誠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國民黨的『改造運動』與陳立夫的被逐離臺」、「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與蔣介石在臺灣的『革命實踐運動』」、「吳國楨治臺及其蔣介石政權的隔洋論戰」、「孫立人對蔣政權的不滿及其『兵變』冤案」、「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半月刊」、「蔣介石父子招撫臺獨『大統領』廖文毅始末」、「臺灣時期蔣介石與美國政府的矛盾」、「臺灣時期蔣介石思想的變化及其『革新』實踐」、「蔣介石日記中的『兩岸密使』」等。

¹⁹ 楊天石，「臺灣時期蔣介石思想的變化及其『革新』實踐」，《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4冊（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7），423。

²⁰ 張淑雅，「蔣介石一瞥——1950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臺灣史研究》第18卷第1期（2011年3月），186-211。

多半是挫折的老人。²¹

楊天石與張淑雅雖使用同樣蔣介石日記史料，他們因不同史觀，描繪的蔣畫像相異。他們的蔣都是部分蔣介石，是「驚鴻一瞥」，依舊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的「過程」。²²

史觀是歷史解讀的管鏡。歷史學者按不同史觀，同樣的歷史人物面貌會相異，同樣的歷史事件會呈現不同景象。因此，史觀讓歷史人物與事件評價不一致，反而多采多姿。

IV 歷史探討的門路、方式、手法——歷史方法

歷史方法是探討歷史的門路、方式、手法。邱燕凌（Emily M. Hill）在思考「最好的歷史學」時，提出「挑選那些他們（研究者）最喜歡的研究方法，並直奔那些最能使他們興奮的研究課題……在作研究期間……修正他們的研究方法」。²³依邱燕凌看，歷史方法是按歷史學者主觀「最喜歡」去「挑選」與「修正」。因此，歷史方法是主觀的。但韋納（Paul Veyne）主張歷史沒有方法。他說：

歷史是理解力的事情……它沒有方法……為了理解過去，只需要使用足以讓我們能夠理解包圍著我們這個世界或陌生民族生活的同樣的眼睛去觀察

²¹ 張淑雅，「蔣介石一瞥」，204。

²² 張淑雅謙言，她看到的蔣是「驚鴻一瞥的印象」，「只能算是驚鴻一瞥，既不完整，更無法對蔣作任何論定」。楊天石為了找尋真實的蔣，大膽地進行「不斷接近真理和真相的過程」。張淑雅，「蔣介石一瞥」，188、207；楊天石，「自序」，《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4冊，vi。

²³ 邱燕凌，「學習歷史最好的方式是什麼——致年輕學者的建議」，裴宜理、陳紅民主編，《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202-03。

它就足夠了。²⁴

韋納的歷史「眼睛」關注三點，即「事物的本性、人的自由和偶然機運」。²⁵韋納雖說歷史「沒有方法」，仍提出「眼睛」的「觀察」方法，即用眼睛觀察歷史「事物的本性、人的自由和偶然機運」，這也是他的歷史方法。任何歷史探討都具主觀性方法。若無方法，歷史無法探討，只是亂寫一通、隨筆隨寫。

事實上，歷史方法充斥歷史界，甚至太多而難以選擇。例如：鑑戒褒貶史法（《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者）、歷史文學批判學法（聖經學者、文學批評學者）、文獻比較批判法（Leopold von Ranke）、多學科結合法（年鑑史派、社會科學新史學派）、歷史心理分析法（Erik Erikson、Lucian W. Pye、余英時）、歷史變量分析法（許倬雲）、計量分析法（年鑑史派、Stanley Reiter、Robert W. Fogel）、區域社會史方法（William Skinner、Philp A. Kuhn、趙世瑜）等。歷史學者都按自己主觀判斷選擇合用的方法，具主觀性。因此，歷史方法沒有絕對，只有合適或不合適。若不合適，還可以修正、更換。

聖經申命記史家按西乃山約因果報應方法，記述兩百餘年士師時代的歷史循環。²⁶當諾特（Martin Noth）使用舊約文獻批判法，檢驗五經資料（JEDP）的不同內容與傳統時，沒有看到申命記史家以

²⁴ 保羅·韋納，《人如何書寫歷史》，韓一字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173。

²⁵ 韋納，《人如何書寫歷史》，173。

²⁶ 筆者認為，申命記史家按西乃山約因果報應方法闡述士師時代七次歷史循環。每一次循環模式與內容是「以色列人行惡→上帝懲罰→以色列人悔改→上帝藉士師救贖→以色列太平」（申 1:26-46；4:1-8、25-40；5:1-16:22；28:1-68；30:1-20；32:44-52；士 2:11-16:31）。

士師為主的歷史循環，反而關注以色列支派同盟歷史。²⁷他發現，以色列支派同盟非僅為上帝律法，更在刑罰違反支派協議與敵對其他支派時出現。²⁸他也看到，以色列支派內部結構是一種血緣結合，持族長式社會秩序，有長老會作代表，主掌司法與重大事務決定。²⁹

布萊特（John Bright）使用聖經、考古學、歷史結合研究方法，先證實士師時代史的歷史性，也探究戰爭與和平的以色列支派同盟史。³⁰布萊特的士師時代史不是申命記史家的歷史循環，反而著眼於三點以色列支派同盟史：第一，從當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適應與調整情況看，以色列支派只能在山區孤立，支派間處於分離狀態；第二，士師在以色列遭遇外邦敵人攻擊與管轄時的超凡恩賜，凝聚支派力量抵禦與戰勝；第三，士師時代以色列支派維持兩百多年長期堅韌的同盟，直到西元前十一世紀末，以色列支派同盟遭非利士威脅，才提出王朝統治。³¹在諾特與布萊特的歷史方法下，申命記史家的西乃山約因果報應歷史循環則不見蹤影。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對歷史學者研究毛澤東「屢試不爽的研究方法」，評為「無濟於事」，提出歐洲中世紀「暴政領主（Lord of Misrule）」與中國思想的「身分倒轉悖論」（物極必反）串聯方法，探討毛在現代中國亂局中攀升至高點與長期維持權力。³²他的歷史方法刻畫的毛，與中國共產黨歷史決議，或官方史家逢先

²⁷ Martin Noth, *The History of Israel*, rev. ed. (New York and Evanston, IL: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60), 42-49, 104-06.

²⁸ Noth, *The History of Israel*, rev. ed., 104-06.

²⁹ Noth, *The History of Israel*, rev. ed., 106-09.

³⁰ John Bright, *A History of Israel*, 3rd ed.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2), 16-18, 44, 56-58, 84-86, 173-74.

³¹ Bright, *A History of Israel*, 3rd ed., 176-77、179、182-87.

³² Jonathan Spence, *Mao Zedo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viii-ix.

知與金沖及，甚至與使用新檔案與口述資料的張戎與哈利戴，皆無法達成一致。他發現，毛不是「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功仍居多的「一代偉人」，也不是自私、不負責、陰謀、邪惡、報仇的化身，乃是墜落在物極必反「身分倒轉」與自我非凡洩氣中離世的「暴政領主」。³³

歷史方法是探討歷史的門徑，歷史學者使用不同方法探究歷史，不同歷史方法讓同樣歷史人物面貌變得懸殊陌生，同樣歷史事件也呈現不同模樣。歷史方法的相異，讓歷史的人物評價與事件定案無法達成共識，但五彩繽紛。

V 從史料、史觀、歷史方法探討歷史史論的諸問題

歷史學者不僅處理過去歷史的人物與事件，還思索其背後的歷史思想與史論。《春秋》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以大義、王道、賞罰、褒貶史觀，記述魯國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西元前 722-481 年）的歷史，但它們因史料的主觀取捨與褒貶評估的主觀性，無法刻畫一個具歷史共識的客觀魯國史像。³⁴《尚書》

³³ 吳江編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60；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85；Spence, *Mao Zedong*, 52-59, 60-61, 69-76, 84-85, 110-15, 118-27, 125-26, 135, 148, 155, 157, 162-65, 175-78.

³⁴ 例如，《公羊傳》與《穀梁傳》的作者都發現，《春秋》作者記述魯莊公去齊國親自迎娶的重要。對此，《公羊傳》作者褒為「禮」，《穀梁傳》作者貶為「不正」。他們對禮與不正的不同觀點，對「迎親」歷史作出不同褒貶解讀。歷史事件評價的分歧帶來不同歷史像，難以讓歷史具客觀性。黃銘、曾亦譯注，《春秋公羊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196；徐正英、鄒皓譯注，《春秋穀梁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174。另外，對《春秋》記錄魯宣公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一事，《公羊傳》看重避其僭號，《穀梁傳》重視歷史簡略紀錄與夷君地位，但《左傳》作者說：「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對同樣楚莊王死亡，《左傳》作者沒有看重避其僭號、簡略紀錄、夷君地

記載夏商周乃至春秋秦穆公歷史時，提出歷史的真理問題。³⁵對明末清初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真相或真實性，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從經濟史觀主張資本主義的萌芽與因素，何素花則從儒家意識形態變化觀點，細察社會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形成的流行風尚景觀。³⁶中國共產黨與官方學者為毛澤東立傳與評估時，埋伏著歷史的不變性與可變性問題。³⁷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與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的文化與文明史觀，不僅看到人類文化與文明歷史的誕生、成長、衰落與解體，還主張歷史發展規律性。³⁸錢穆在自認「中國有史以來

位，乃矚目當時楚、晉、魯諸國外交史與軍事史的不同發展。《左傳》作者對歷史事件的處理手法，讓魯國史具多面而主觀性歷史景觀。黃銘、曾亦譯注，《春秋公羊傳》，458；徐正英、鄧皓譯注，《春秋穀梁傳》，448；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850。

³⁵ 王世舜、王翠葉譯註，「今文尚書——皋陶謨、湯誓」，《尚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38、42、51、97；「今文尚書——高宗彤日」，125；「今文尚書：洪範」，144-45、149；「今文尚書——康誥」，193；「今文尚書——召誥」，219-20。

³⁶ 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包括鄧拓、呂振羽、劉大年、翦伯贊、傅衣凌、黎澍、尚鉞、傅筑夫、李競能、李之勤、吳大琨、陳湛若、徐一夔、鄭天挺、彭澤益、湯明樾、李龍潛、張維熊、韓大成、胡嘉等。何素花的研究是「清初社會秩序重整理念與對世風的批評——以江南為例」，《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3 年 5 月號，總第 14 期，2003 年 5 月 31 日。

³⁷ 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評估與傳記有 1945 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021 年「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從新的檔案史料與口述採訪資料寫毛傳記的有張戎與哈利戴的 *Mao*、潘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 與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 的 *Mao: The Real Story*。從不同史觀評估毛的有余英時的「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 的 *Mao Zh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遠志明的《神州懺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透過不同歷史方法探索毛生平的有白魯恂 (Lucian W. Pye) 的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的 *Mao Zedong*。

³⁸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1-*Form and Actuality*, Rogue Scholar ed. (Rogue Scholar Press, 2021), 108, 200-17, 220 387, 391;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2-*Perspectives of World-History*, Rogue Scholar ed. (Rogue Scholar Press, 2020), 93, 109, 297, 325, 350-52;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 1, abridgement of volumes by D. C. Somervell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36-43, 48-163, 164-243, 244-359, 360-558;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 2, abridgement of volumes by D. C. Somervell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 172, 214-18, 232, 236, 286-87, 298, 307.

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即 1930 年代，撰寫《國史大綱》，不僅發掘「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更從歷史認識性自覺中高舉歷史意識。³⁹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探討從人類始祖亞當至未來上帝審判日的「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歷史時，提出直線、曲折直到終極點的歷史進程。⁴⁰余英時探討清代戴震與章學誠的儒學時，提出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說。⁴¹史景遷透過清初山東郊城農民、困苦受害者與他們妻子等小人物的困苦、掙扎、行惡、悲命，發掘清朝庶民生活史、經濟社會史、官吏史。⁴²與此同時，他強調，小人物也是歷史舞台的重要人物。

筆者認為，古今東西歷史學裡，主要史論及其爭議主題至少包括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歷史的真理性、歷史的真實性、歷史的不變性與可變性、歷史的規律性與法則性、歷史意識、歷史的開展、歷史的內在發展、歷史發展中區域與小人物等九主題。這些史論及其爭議主題，自古至今雖不停地質疑、探討、討論，仍眾說紛紜，無法達到共識。

筆者在以下九章，從史料、史觀、歷史方法之歷史探討三要素，對九個史論或歷史思想進行探索。筆者質疑，歷史是否客觀？歷史

³⁹ 錢穆，「書成自記」，《國史大綱》，臺七版（臺北：國立編譯館，1960），1-4；錢穆，「引論」，《國史大綱》，臺 7 版，7。錢穆說：「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於鑑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錢穆，「引論」，《國史大綱》，臺 7 版，2。

⁴⁰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上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44；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下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90、694、707、712、757、793、812-13、894-1161。

⁴¹ 余英時，「增訂本自序」，《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0），2-3。

⁴² 史景遷，《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李孝愷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5-157。

能否發現真理？歷史人物與事件可否尋索其真實性或真相？歷史能否不變？歷史是否真有規律性與法則性？探索歷史意識讓過去、現在、未來銜接與串聯的可能性，歷史是否發展或循環？歷史的內在發展是否影響歷史，以及區域與小人物能否登上歷史舞台的問題。